

# 贵钢搬迁与 B 村社会关系变迁

## ——以贵州省 B 村研究为例

姚林<sup>1</sup>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在大力发展城镇化的今天, 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已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选取在贵钢搬迁事件中, 受影响较大的一个南方村落——B 村为研究对象, 对 B 村的场域、资本和行动者的惯习三者之间的变化与联系进行剖析, 结果显示: ①场域的改变, 使 B 村村民对土地的依附感消失, 转而进入商品化的交际场所; ②原本以社会地位最大化去建立社会资本的 B 村人, 逐渐转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③村民们的惯习也呈现逐利化倾向。通过搬迁前后 B 村社会关系的对比发现, 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渗透, 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场域的改变与重构及村落舆论的失效和身份认同的改变, 是 B 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真正原因。B 村社会关系由原来的高频率、熟人社会交往, 逐渐演变到如今的开放且大多浮于表面的交往, 依托情感建立的社会关系, 因为工具性(经济理性、算计)加入, 以前的熟人社会关系正逐步瓦解。

**【关键词】:** 社会关系 变迁 场域重构 行动惯习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关系是社会研究的课题之一, 而农村社会关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基础, 尤其在城镇化进程较快的今天。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 为研究农村社会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到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提出, 再次掀起研究社会关系的高潮。乡村社会关系是农村研究的一个重点, 认清我国乡村社会的关系结构及性质对于研究我国农村内部的组织与运行, 推动农村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张国芳, 2011)。因此, 乡村社会关系是理解乡村社会现象的重要基础。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新特材料循环经济工业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首贵项目)是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项目之一, 它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之一。截至 2021 年 5 月, 首贵项目已全部完成征地相关工作。在此次搬迁中, B 村除了六组 178 人未搬迁之外, 其余全部搬迁, B 村是此次搬迁中征地面积最大、搬迁人口最多的一个村。从 2009 年 9 月开始离开土地之后, 到如今, 历时近 12 年的时间内, B 村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具体表现为何种形式? 基于此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展开研究。

## 1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 B 村

### 1.1 场域空间的重构

**作者简介:** 姚林(1987-), 女, 贵州修文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 项目名称: 大数据环境下的负载均衡问题研究, 合同编号: 黔教合 KY 字 [2017]137; 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 项目名称: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平坦化技术的负载均衡问题的研究, 合同编号: 黔科合基础 [2018]1082

### 1.1.1 物理空间的变化。

B村在未搬迁之前，位于图1的B处，而在搬迁之后，整个村庄位于A处，即为镇中心，两处间隔4.6km，物理空间发生明显的改变。搬迁前位于B处的以熟人社会关系为主的场域逻辑，逐渐演变成以经济理性为主的场域逻辑。

### 1.1.2 符号空间的转变——“农民”到“失地农民”。

“农民”到“失地农民”，符号的变化也蕴藏着心理的改变，这其中包括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及认同背后的社会建构，这些变化，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关系。



图1 搬迁对B村物理空间的改变

对于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呈现出身份角色的错位性认同、土地情结的鸡肋性认同、经济生活的剥夺性认同和制度环境的失衡性认同。这种认同系统背后的原因是基于失地农民特殊的时空记忆和所经历的时空转换而导致的社會建构(郁晓晖、张海波，2006)。

身份角色的错位性认同，即认同的延宕和缺失。对于B村村民而言，物质系统的迁移并未带来认同系统的同步转换。相对剥夺是指在与其它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与个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这种“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现象揭示了参照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作用(周晓虹，1997)。本文试从两个维度去解释这种现象：一是纵向维度——时间；二是横向维度——空间。

从横向维度看，B村村民聚村而居，原因如下：①每家耕种面积小且住宅和农场的距离不远；②方便一起共同用水，增强合作关系；③人多安全性高；④土地平等继承，从而一代一代不断壮大村落。由于搬迁，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基本依托，失去了传统谋生技能的用武之地(刘奇，2013)。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五大转换问题：一是职业转换问题。搬迁前的B村村民大多从事第一产业，搬迁之后，他们要从第一产业转变成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对于文化和技能都不高的他们来说，实属不易！年轻人也许还可以通过不断学习顺利转变角色，但是中老年人呢？对于这类群体来说，要他们再去学习以适应角色转变，这种可能性非常低或是没有。二是身份转换问题。B村的村民以前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享受国家对他们的各种补贴，但是现在，他们是失地农民。三是生存环境转换问题。从相对集聚的村落到一幢幢的高楼，从以前的熟人社会到现在是“熟悉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过去世代稔熟的诚信链变成了邻居互不相认的契约链(刘奇，2013)。四是生活方式转变问题。以前的B村村民，生活方式自由；可现在住高楼就不同了。吃啥都要钱，干啥都要有所顾忌，怕影响到别人。五是价值观念转换问

题。传统的乡村文化碰撞现代城市文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适应了农民的身份和还未习惯非农的生活方式的心态的摩擦，以前邻里之间互助是理所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原本以为在理的事情，搬过来却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处于想改变但却改变不了的尴尬境地。

### 1.1.3 商业市场空间的建立。

按照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贴标准，凡是失地农民，可按每667m<sup>2</sup>地5m<sup>2</sup>、每人2m<sup>2</sup>进行优惠购置，价格为1200元/m<sup>2</sup>。如果处于各种原因不购置的，政府将会以1200元/m<sup>2</sup>的价格进行回收。为了以后生活多一些保障，大多数B村村民想方设法都会找钱把门面费补齐。这项政策，对于B村的村民来说，无疑是给他们的后续生活多一条出路。有了门面，B村的村民就可以做生意，也算是一条出路。村民们勤劳的本质还在，但是经济理性已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朴实的B村村民逐渐变得不再朴实。

## 2 资本转换

### 2.1 资本转换

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98)。在B村，经济资本主要有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社会资本主要为社会网络；文化资本主要为知识、技术和信息；符号资本则为农民。在未搬迁之前，B村村民以追求社会地位最大化为目标，不惜动用他们身边可利用的一切资本，如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便目标最大化实现。搬迁之后，让B村村民明白一个道理，“钱、权”是获得利益的关键。搬迁后的B村，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追逐“实权”为最终目的，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增加社会资本，搬迁前后目的正发生着转变。

### 2.2 资本类型转换

搬迁改变了B村人的行动空间，让B村发生了场域重构。那么，在不同场域中，不同种类的资本将会发生怎样的转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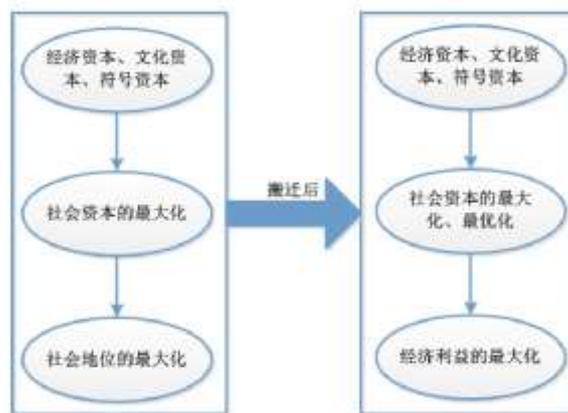


图2 搬迁前后B村场域资本转换关系

由图2可以看出，在以社会资本为基础资本的前提下，B村人充分利用了他们所在场域的各项资本，以达到适合场域发展的最终目的，而目的的改变，也标志着B村正发生着变迁。

未搬迁之前，B村是一个生产生活实体，这一实体中的行动者是熟人社会关系，村民们认为村里面德高望重的人会比村干部

---

有权威性，说明社会地位在村里的重要性。行动者会动用身边的一切可利用资本，如经济的(上大学)、符号的(农民这个符号会让他们通过干农活增加并增强他们的社会网络)和文化的(上大学、德高望重)，以增强他们的社会资本，最终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

搬迁之后的B村，让村民们充分的看到拥有实权的好处，这对于已经失去土地的行动者来说，对他们心理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这让他们认识到，能获得让他们有实权的社会资本是多么的重要(有权就有钱，有钱不一定有权)。在新建立的这个场域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失地农民)及社会资本与原场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符号资本是为建立最大化、最优化的社会资本服务，而拥有最大化、最优化的社会资本最终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 2.3 行动者的惯习

惯习是在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这种建构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性情倾向系统里，而这些性情倾向既在实践中获得又指导着实践；既被结构形塑而成，又处在结构的生成过程当中。这些建构工作存在于实践的建构活动中，也存在与对实践的反思中。惯习不是习惯，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里面，是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存性能力。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它有助于让场域充满意义且赋予场域惯习感觉和价值。贵钢的搬迁，造成了B村由原来有土地的场域变成了现在的居民楼社区，不同的场域孕育不同的惯习，那么，这当中，B村的行动者惯习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呢？

#### 2.3.1 地方政府由“求”到“管”的转变。

由于地方政府的特殊地位和责任，决定了政府在资本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场域中，起主导地位的一方必定影响着整个场域惯习的形塑。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政府下达税费指标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完成任务。村委会能否完成任务关乎政府后续工作的开展，换句话说，政府得“求着”村委会。因为税费改革，地方政府由“求”着村里面到“管”着村里面，这种变化一直延续至今。地方政府依靠权利这个符号资本，在搬迁前后的B村起着主导作用，且这种主导作用通过搬迁项目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 2.3.2 村委会从“不想干”到“抢着干”。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它并不属于政府部门，但却是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纽带。村委会既代表政府又代表村民，扮演着双重角色。村委会对于未搬迁前的B村而言，是个苦差事，村民从以前的不想干村委会，到现在的争着抢着干，究竟是为了什么？村委会本是服务于村民的自治组织，是个苦差事儿，现在却越来越向“资本化”靠拢，人人都想当村干部，甚至还出现贿选现象，现在的村委会是个“肥差事儿”。此次搬迁，让村民看到的现实是，凡是村里面的干部，通过此次搬迁，家家都“发”了。

#### 2.3.3 村民从关心“农忙”到关心“选举”。

未搬迁前的B村村民，主要就是种地，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季节种什么最赚钱，国家的农业补贴啥时候能到，对于选举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谁当都一样。通过这次搬迁，让他们知道，只要和村干部沾上点边，攀上点关系，就会有赚头！新的场域，新的符号，逐渐增加了他们的功利性，形成较以往不同的惯习。

## 3 B村社会关系的变迁

### 3.1 家与家际

---

### 3.1.1 家庭内关系的变迁。

#### (1) 夫妻关系。

一个家庭中，夫妻之间是否经常吵架决定家庭的和谐度。搬迁，本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个好项目，但是，B村却因为这个项目，夫妻之间不和的比比皆是。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B村未搬迁前，不管家里由谁做主、经济大权由谁掌握、家务事儿谁干，至少夫妻之间有商有量，虽然小吵小闹在所难免，但至少是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整体相处还是和谐的。搬迁之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夫妻至从搬到安置区、失去土地之后，都先后出去打工，有的分居两地、有的是一方出去打工，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和家里，都是处于分居状况，日子久了，夫妻间的感情必定疏远。

#### (2) 亲子、兄弟姐妹关系。

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处于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兄弟关系大过妻子的关系，而家庭中继承者的考虑也是首选自己的孩子。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与自己血缘最近的人相处融洽，才能算是家庭和谐。在B村，农忙时节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家”（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人，家里大小事，还是自己家的人跑得快些。搬迁之后，通过在贵钢指挥部收集到的关于处理B村家庭纠纷的台账发现，贵钢的搬迁，让B村的家庭内部矛盾激化、关系逐渐疏远。

### 3.1.2 家际关系的变迁。

#### (1) 人情圈加速瓦解。

人情，按类别来分，可分为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仪式性人情通常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或某件事（如婚丧嫁娶）而伴随仪式的举办形成的人的交往与聚集。它的举办给予了参与者更多的交流、联络感情的机会。而日常性人情通常是指生产生活中劳动、物资的交换而形成的亏欠感（陈辉，2012）。劳动交换表现为生产上的互助，即“换活路”。笔者在实地调研B村时，收集到在搬迁时，关于处理B村户与集体土地纠纷7件、户与户争议土地纠纷29件，通过这些争议事件，更加加深了B村家际之间的矛盾，加速了人情圈的瓦解。搬迁，带来了经济，但却逐渐带走了B村人家际之间的关系。

#### (2) 聊天圈因利益重组。

未搬迁前的B村，虽说组间联系较少，但是至少组内联系还是较为频繁，因为不论是农忙还是村里利益分配，均是以组为单位，虽说不像以前那样，是熟人社会，但至少是半熟人社会。搬迁之后，使B村人陆陆续续搬迁到镇上安置区生活，搬迁到安置区后，因为搬迁时的纠纷，加上一年多在外面租房住，长期的没联系，此时的B村，虽说是“重聚”，但也只是地理位置的重聚罢了。B村人的聊天圈正逐步瓦解，只有涉及到个人利益时，才会聚在一起商讨。此时，他们目的明确，也并无闲谈之心，聊天圈因为利益关系而得以重组，却以因为利益关系而导致破灭。

#### (3) 网络的作用——缺场交往的开始。

至从搬迁后，因为搬迁安置款、土地补偿款、安置政策等，B村的村民们也开始学会了上网。贵钢的搬迁，B村人认识到网络的巨大能量，他们学会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诉求，在网上查找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等。网络让他们原本还在走动的家庭之间，越来越疏远，但却与科技越来越近。缺场交往让横向经验成为主导且影响着主导经验，它在增加更多社会认同感的同时，却潜移默化地带走了B村人实际的家际交往关系。

### 3.2 村庄与地方政府

### 3.2.1 村民与地方政府——既近了，又远了。

未搬迁前的 B 村，对于村民们来说，地方政府在他们心中，是最有权有势的地方，他们一般不会去那里。通过村民访谈可知，政府部门对于未搬迁前的 B 村村民来说，是多么近而又多么远的事，近是因为政府部门距离 B 村仅仅 2km，为了不麻烦，有事尽量都让村委会带劳或干脆算了。他们与政府是种“及近又及远”的关系。

搬迁之后，通过 B 村与政府部门关于土地的纠纷台账，可以清晰的看到，政府在处理这些地类纠纷时的合理性。但是在 B 村村民心中，他们是不满意的。此次搬迁，村民们与政府部门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矛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比起以前，他们会用“看透了”，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印象。现在的他们，居住在镇上，政府部门就在他们的家门口，近是近了，但是却又是更远了。

### 3.2.2 村干部与地方政府——开展自治的尴尬。

村干部是“双重角色”，既服务于村里面又要把上级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这当中必定会遇到权利的掣肘或利益难权衡的时候。身处尴尬境地的村干部，是怎样和政府部门处理关系的呢？

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无形中增加了村自治、居民自治的难度。如何在不脱离政府的前提下，高效的开展自治，是村委会或居民委员会与政府部门进行长期的博弈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 3.3B 村社会关系新特点

### 3.3.1 交往面扩大且分层，整体质量降低。

搬迁前的 B 村村民，居住集聚，从事劳动单一且相同，大多从事农业，组内联系较为紧密，农业把家与家之间联系起来，对农事的讨论、经验的相互探讨、农忙时的互助合作、邻里间的相互走动，都为增强彼此间的感情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差序格局”对搬迁前的 B 村来说，仍然是适用的，还是以血缘为中心依次向外推开。2009 年底，贵钢项目落户 B 村，搬迁项目的启动，让 B 村人告别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来到镇上生活。为了生计，他们“硬着头皮”学着镇上居民的生活，开始工作、做生意。业缘的注入，地缘的改变，让他们的交际范围扩大，但是这些交际仅仅只是浮于表面，可有可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观念注入 B 村人的思想，造成他们的交际开始分层。

业缘成为继血缘之后，推开差序格局又一重要诱因。村民们依靠工作关系，结交更多的朋友，但是这种朋友仅仅只限于讨论公众话题，而涉及私人问题只有和自己“信得过”的人讨论。信得过大都是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则更为可靠。继业缘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地缘，而此地缘非彼地缘，搬迁后的 B 村村民，不会因为是隔壁邻居，而主动相互认识，这要在以前，是不可理喻的及不能理解的。而如今则是在血缘和业缘的基础上，才会有所熟悉。隔壁邻居又怎样，没什么来往，认识又有何用。以利益为中心，血缘、业缘、地缘依次为推开因素，建立起了当今村民的社会关系，范围扩大了，中心变了，整体质量也降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残酷但却很真实的话正在 B 村上演。

### 3.3.2 交往的理性、算计成为主宰关系亲疏的核心因素。

理性的含义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原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谢立中，1998)。所以，在搬迁之后，我们看到依据血缘建立起的亲密关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只要利益足够大，血缘就会让位于它。经过搬迁后的 B 村村民，见证了村里曾经的姊妹、兄弟等血亲关系在利益面前被撕得粉身碎骨，老死不相往来。异常亲密的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姻亲关系都是建立的经济基础之上，相反，他们的破裂也是因为经济。曾有学者认为“情感+工具”是确定关系亲疏的准则，

而通过搬迁之后，此法则发生了改变，变为“工具+情感”，工具性变成首先因素，而工具性背后便是经济理性和算计思维，这是维持及增进情感的核心因素。

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地缘仅次于血缘，成为联系感情亲疏的第二因素。而在搬迁后的 B 村，有的家连对面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地缘对于他们来说是“远亲不如近邻”和“不要把周围关系搞臭，免得人家说你这家人不合群”的功效，但是不论怎样交往，他们不会与因地缘或业缘而结交的朋友交心，交往仅仅浮于表面，而依靠血缘建立起来原本很牢固的亲缘关系，也被逐渐形成的经济理性和算计而逐渐变得脆弱。因为经济问题而血亲之间断绝关系的例子，在笔者的周围也时常有发生。总之，以血缘为中心向外推的差序格局，中间加入地缘、业缘和拟亲缘等，逐渐向外扩散，但是只要经济利益足够大，算计足够强，都可以破坏乃至摧毁任何亲密关系。

### 3.3.3 交往中契约的普及、深入及加强。

传统的宗族和乡规民约在 B 村人当中已逐渐失去效力，“口说无凭，写字为据”成为他们的普遍认识，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会必要性的走法律程序，这样就会更加有保障。现代化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已经改变传统 B 村人基于“情”而处事的原则，业缘的不断扩大及周边的例子，为维护好自身更加合法的权益，他们不得不去学法，了解法，以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在以前的 B 村，是根本不可能的。上法庭、签合同，那是城里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在 B 村，“说了就算数”这句话的效力已经成为过去，经济理性和算计思维主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契约规范和法律关系在维护社会秩序及村民信任上已逐渐成为主导，城镇化让 B 村村民对契约及法律经历了冲击、震荡、接受并逐渐内化，使人们的交往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

## 4 总结

### 4.1 新的社会关系系统出现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现代化与市场化因素的注入，使 B 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社会关系也出现新的特点，随之改变的便是社会关系系统。费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来描述农村社会关系，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扩大，这种格局加入了不少元素的注入，如业缘、趣缘、拟亲缘等，使它的范围越来越大，关系也越来越薄。费先生认为此种格局是从血缘开始推，当然关系也是最为亲密的，然后便是地缘，最后才是业缘、趣缘、拟亲缘等，关系逐渐递减，但是对于此次搬迁后的 B 村而言，只要工具性(切身利益)足够大，这几种缘的位置是可以相互变化的。即因业缘而结交的关系亲密度可以大过与生俱来的血缘而带来的关系亲密度，其关键因素便是要看这个利益的强度大小。之后的徐晓军，便通过研究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提出了“内核——外围”之说，他认为，对于农村的社会关系，处于内核之中的社会关系是高度情感化，而处于外围之间的社会关系确是高度利益化，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但是用研究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来说明农村社会关系，尤其是处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关系，笔者认为是有待商榷和偏颇的。针对 B 村的社会关系，结合费先生的差序格局和徐晓军的“内核——外围”模式，笔者拟作出下面模式，来描述 B 村社会关系之间联系与变动系统，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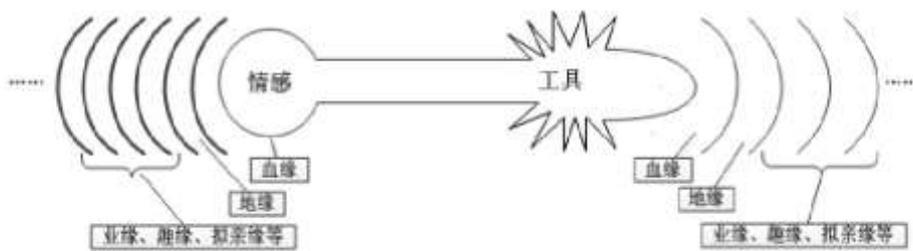


图 3 B 村社会关系系统

---

在图 3 中，情感和工具主宰了波纹的力度和范围，依据情感而推出去的波纹，力度大，产生的关系厚重，关系与关系之间间隔较小，说明关系间较为亲密，中间再依次插入血缘、地缘及业缘、趣缘及拟亲缘等，至波纹的范围再次扩大，力度也依次递减，关系持续的时间也逐渐缩短。而依靠工具性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本身引起的力度较小，所以产生的关系线较弱，消失也较快，关系与关系之间的间隔大，亲密度较差，即使中间也会有血缘、地缘和趣缘、业缘及拟亲缘的加入，其厚度及力度都不及依据情感而推出去的波纹大。

## 4.2 社会关系成因分析

### 4.2.1 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渗透，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及商品化概念已逐渐渗入到我国的每个角落，B 村也不例外。尤其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政府大力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自谋生路，商品化概念已深入 B 村人心中。搬迁导致 B 村彻底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壤，生产方式及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务工、做生意及土地补偿款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货币已成功取代他们日常生活中自给自足的物质，金钱的多少已成为家与家之间相互攀比的重要准则之一，人们的日常交往更多的是理性及逐利，情感已逐渐变得越来越淡，甚至成为人们获利的工具。家庭中的核心关系(夫妻)发生转变，代际关系失衡，人们的日常交往更多的是经济理性及工具性，所有这一切都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

孙立平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探讨差序格局，在他看来，差序格局不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关系或道德模式，更是获取稀缺资源的一种分配格局。在传统封闭的农村里，血缘和地缘是提供稀缺资源的主要途径，村民对此也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市场元素的注入，血缘与地缘提供稀缺资源的能力被大大削弱。落实到 B 村，搬迁后的 B 村，离开了土地，生活环境开放，信息发达，原本形成的熟人社会也逐渐解体，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他们已经像以前那样，需要依靠血缘或地缘来获得所谓的稀缺资源。

### 4.2.2 场域的改变与重构。

布迪厄指出，场域的改变，必将带来惯习与资本的改变，这点对于 B 村来说，同样如此。搬迁至镇上的 B 村村民，居住环境从以前的院落式到现在的单元楼式，院落的取消意味着私人空间的延伸与公共空间的交叉也被取消了。单元楼造成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限分明，楼房内格局鲜明，人们与陌生人的往来增加，以前村落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约束小孩们的传统村落规范也因私人空间的增加而逐渐消失，原子化家庭在逐渐增加，人们的交际越发个体化与私人化。

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的工具性，这点从人们的礼物交换得以充分的体现。依靠传承的亲属关系及父辈建立的邻里关系间的走动如今已演变成简单的商品交换，情感成分很少或是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依靠业缘、趣缘或学缘等建立的人际交往的商品交换或是礼物交换。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其背后蕴藏的是情感性与工具性。搬迁改变的不仅仅只是 B 村人的地域，更多的是格局，一种将家庭推向原子化、将人们的社会关系推向个人化的陌生人社会格局。

### 4.2.3 村落舆论与身份认同的改变。

搬迁改变了 B 村原本较为封闭的村落环境，扩大了公共空间的使用范围，人们与陌生人的交往频率的增加，已使得原本村落的舆论效应大大降低。大众媒介的迅速传播与繁荣，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人们所能感知的世界，社会舆论的倡导与价值观的宣传，降低了村落舆论对村民的形塑与约束力。在新价值观还未完全深入人心的转型期，B 村人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他们接受的看似“主流”的价值观，变得“拜金”和“唯利是图”。访谈中笔者发现，村民们关注的新闻掺杂过多的功利因素，涉及道德层面的东西却很少关注，对于从农村解放出来且相对单纯的 B 村人来说，处于自我防卫的本能及对厉害的考量，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这看似“主流”的价值观潮流，对于以前的村落舆论，将会变成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

B村世世代代的农民身份，经过短暂的时间(大约四年时间)摇身变成了居民，身份认同也从农民转向市民，他们强硬的学着一系列市民的规范与准则，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内在感知的转变改变了B村人的人际交往方式，是他们做出了与“市民”相符的行动。村落中传统的管理建构逐渐(依据身份认同做出相应的动作)消失，慢慢助长了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并做出相应的动作，新身份的震荡还在继续，趋于稳定后的状态谁都无法预料，至少现在，传统的村落舆论及农民的身份认同效应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众的普适价值观及一系列市民效应(依据市民身份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

#### 参考文献:

- [1]张国芳. 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社区社会关系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1(1): 25.
- [2]郁晓晖, 张海波. 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1): :46.
- [3]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 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刘奇. 中国失地农民面临四大难题[EB/OL]. 中国乡村发现网, 2013-08-08.
- [5]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6]孙立平. 社会学导论[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
- [7]孙立平.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 社会学研究, 1996(5): 20-24.
- [8]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 [9]陈辉. 人情债、人情圈与交往逻辑变化[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2012(14): 117.
- [10]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11]格兰若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